

工业旅游形成得天独厚的竞争力，比如历史遗存、高科技创新、生产工艺等。与此同时，旅游也为工业带来了巨大附加值，比如品牌提升、产品推广、形象宣传等。在学理维度上，学界显然可以借助这些工业遗存，推动糖业历史的学术研究。此类工业遗存是制糖工业历史书写的直观、生动的素材，踏查、整理抑或触摸、欣赏这些遗存，均有助于丰富研究者对于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历程的现场认知，进而有利于制糖工业历史的书写以及糖业历史的整体描述。

此外，纵观当代中国制糖工业的发展历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对制糖工业高度重视，采取了很多相关政策，有效推动了制糖工业的持续发展。在制糖工业企业内部，企业党委的直接领导则构成糖厂组织生产和发展转型的核心要素。这是国有企业发展和转型历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既是制糖工业得以筹建、发展和壮大的首要保证，也为当今工业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需要在今后的相关历史研究中给予足够重视。

综上所述，开展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正当其时。除了以上所列较易突破的重点领域外，还有其他较多论域颇值得关注。比如，国营制糖厂研究关涉单位制度、国企改革等话题，糖料种植分析及工农关系、产业布局等论题，食糖消费讨论又与高级营养品、凭票购糖、吃糖习俗、用糖习惯、礼物流动等一系列历史文化内容密切相关。因此，当代中国糖业史研究大有可为。历史学界有必要加强整理系统完整的档案文献、收集丰富的报纸期刊、汇集一大批生动的口述资料等基础工作，夯实当代中国糖业史的史料储备，聚焦中国糖业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及当代中国制糖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历史问题，进行宏观分析和重点研究，丰富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相关议题。

（本文作者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当代公共生活的历史学思考

——以成都茶馆作为个案

王 笛

茶馆是传统的、最基层的文化单位，是中国人进行交流与社会互动的一个中心。在飞速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虽然茶馆面临各种公共空间的挑战，但它们在成都继续焕发活力，甚至日趋兴旺发达。茶馆一直都是街坊邻居间的社交中心，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视角去观察社会、文化和政治转型。因此，若欲完全了解一个城市，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最底层，去考察这个城市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单位。此外，以茶馆生活作为着眼点观察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历史研究者将看到改革开放给公共生活的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并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在 21 世纪前十年的城市改造中，成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拆大建，街角茶馆赖以生存的老街道和旧社区日趋消失，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爆炸式的城市发展以及新商业文化的兴起。成都的命运和中国其他古城相似，古代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魅力、面貌和文化，而现在这些独特性正在逐渐消失，各个城市在外貌和内在文化上越来越趋于同质。因此，对于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和城市史学家来说，恢复和保存中国的城市遗产是一项重大的使命。

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笔者业已耗费 20 多年的时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一书中就有若干页涉及茶馆；1997 年，笔者完成了关于茶馆的第一篇论文；2008 年出版第一本关于茶馆研究的专著；2018 年出版第二本茶馆研究的专著。这些年来，经常有人会问笔者这样一些问题：研究茶馆到底有什么意义？这个课题是否能

够提供对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一种深入思考？在此，本文拟就此作出一些初步回答。

一、从茶馆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转型

笔者以茶馆为中心，通过考察 1949 年以来的公共生活，试图揭示政治的变迁如何影响、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从 1950 年至粉碎“四人帮”，茶馆和公共生活从繁荣到衰落，但改革开放促使了茶馆和公共生活又从衰落发展到繁荣。在第一个阶段，持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使人们被迫退出公共空间；在第二个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人们重返公共生活。从茶馆研究中，可以看到大众文化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和延续性，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众文化也没有因窒息而完全消失；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因空前的现代化、商业化、全球化的冲击而消失。

1949 年后逐渐塑造的社会主义文化，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受到国家政权的更多更深的的影响。比较民国时期，我们会发现 1950 年后的茶馆已经有了许多不同。首先，从私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甚至是国家所有制的转变，推动了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做生意、娱乐、社交等活动都被改变了。其次，政府的政策对茶馆的管理与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茶馆的注册、雇佣、税收、经营等环节均被政府所干预。再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对茶馆的生存造成极大影响。最后，茶馆娱乐的结构和形式都受到政府监管，这对茶馆和休闲所造成的影响，在之前的城市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

20 世纪 50 年代小商业经济的不发达以及国家对大众娱乐的管控，导致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衰落。不过，即便再强大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短时期内完全控制小商业、公共空间以及整个城市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传统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在 50 年代得到一定持续，与茶馆相关的公共生活名义上还在延续。但当坐茶馆被认为是落后的生活方式，加之国家消除此类“不良”习惯的努力，坐茶馆所遭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茶馆顾客直线式下降，除了那些年老的、对坐茶馆有着根深蒂固感情的顾客，茶馆里已很难觅见年轻人的踪影。但是在 1979 年之后，中国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国家渐渐放松了对小商业、大众娱乐和商业文化的直接控制，留给茶馆更多空间，以供人们进行公共生活与社会活动。

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日常生活的步伐也加快了。虽然成都和中国其他大城市相比，生活节奏要慢很多，但是成都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影响，茶馆、茶馆文化以及相关的公共领域在形式上、程度上都发生了极大转变。在当下成都的公共场所中，有了各种各样的娱乐休闲设施可供选择，诸如咖啡馆、酒吧、网吧、卡拉 OK、私人俱乐部、舞厅、电影院、豪华酒店以及其他现代娱乐场所。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成都人的休闲和娱乐有了非常多的选择，但茶馆业非但没有因为它们的竞争而衰落，相反，茶馆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样一种强劲的发展，也没有人看到任何一种传统的公共空间在整个 20 世纪遭遇了如此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风风雨雨之后，仍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咖啡馆和酒吧并没有取代茶馆或抢走茶馆的顾客。喝茶对于那些消费能力有限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来说，是再适合不过了。虽然年轻人喜欢去西式的咖啡馆或酒吧，但是一些中高档的茶馆仍然能够吸引中老年人。当代中国城市的咖啡馆和酒吧基本上是西式的，很少有中国传统的因素，但茶馆乃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在咖啡馆或酒吧中，没有出没于茶馆的那些小贩、算命先生、挖耳匠或擦鞋匠等。与现代化的咖啡馆和酒吧相比，茶馆包含了更多的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元素。在茶馆中，顾客只要花很少的钱，便可以待上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不断加水而不必重新买一杯茶。在低档的街角茶馆，哪怕是陌生人也可以闲聊，这为普通人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二、研究茶馆是否能回答大问题？

今天的成都仍然拥有超过任何其他中国城市的茶馆数量。20 世纪下半叶，茶馆在城市中的角色

和重要性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相比，中国城市有着更多的公共空间。今天的茶馆不得不与其他场所争夺顾客，比如室外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人行道、自由市场、购物中心、公园等，室内的公共空间如剧院、电影院、画廊、博物馆、展览馆、拱廊、餐馆、咖啡馆等。然而，就像前现代时期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公共空间一样，茶馆仍然是大众文化的一个持久性象征，它在深远的政治变革、现代化以及全球化进程之中继续发展和演变。因此，茶馆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当代史研究课题。深入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角色，能进一步帮助研究者理解包括成都在内的整个中国城市社会以及中国城市社会与社会主义政治变革之间的广泛联系。

通过考察 20 世纪下半叶的成都茶馆，笔者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国家和政府怎样介入小商业的经营之中？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娱乐活动和形态是怎样在地方社会中被建立起来的？传统行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如何走向死亡？政治运动怎样改变了茶馆和公共生活？在改革开放时期，茶馆是如何走向复兴的？公共生活如何影响城市形象，国家和人民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等等。通过回答这样一系列问题，历史研究者可以对成都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产生更深入的理解，并从成都的茶馆历史中折射出其他中国城市的一些普遍现象。

研究成都茶馆这样的小问题，其间不乏笔者的宏观思考，贯穿整个研究的核心论点可以归纳为下面四点。其一，在社会主义初期，国家和政府几乎掌握了所有资源，主导着公共生活的场所以及娱乐活动的各种形式与内容，许多娱乐和大众文化的传统形式逐渐消失了。其二，改革开放是公共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国家减少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公共生活逐渐复苏并变得越来越自由，日常生活更多被广泛的开放市场和经济改革所支配。复苏后的公共生活与之前的形态具有很大区别，新兴的商业文化对茶馆和茶馆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新时期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时代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延续性，仍然深刻影响着现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前者是转向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形态的时期，后者是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形态的时期。其四，社会主义国家从未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故而有关市场经济的发展乃“国家的退出”“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等是一些误导性的论断。改革开放后，国家积极介入消费和经济文化，但是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尽管新的消费文化无疑比之前更加丰富多彩，但地方文化的特质越来越弱。显然，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有利于统一文化的形成，但也会削弱地方文化的生存能力，地方文化的内在力量被不断削弱，这无疑是一个需要从历史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并逐步重视起来的问题。

三、从茶馆看公共生活和政治文化

笔者将公共生活视为每天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社交、休闲和经济活动，与发生在家中和其他隐匿于公众视线之外的私人生活相对应，所讨论的“公共生活”的概念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人们共享公共空间中的活动，这些人大多是陌生人；在这样一个地方或空间里，人们对隐私没有期待；人们的活动可由社会、休闲或其他相关因素所驱动；公共生活中的活动可被特定的政治形势和总体的政治文化所影响；主要关注公众自发的活动，尽管也不排斥讨论一些在公共场所发生的由政府支持或资助的活动。

毫无疑问，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震动，但不能就此认为一切都是全新的东西，过去的一切都被抛弃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一些传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文化和社会习俗显然不可能轻易或完全被摒弃。社会的确在发生剧烈变化，然而哪怕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和社会变动试图重塑日常文化和生活方式，挤压了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许多传统依然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充分显示了传统文化的一种持续性。因此，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并存。

同时，笔者的研究兴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如何被施加到公共空间特别是成都茶馆之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如何导致了公共生活的改变。随着 1949 年后社会主义制度的

逐步建立，中国的日常生活经历了根本性变革。尽管我们知道这场变革的重要性，但对具体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城市社会底层的生活知之甚少，而成都茶馆的研究便提供了关于日常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层面。

笔者对成都茶馆的整体研究关注的是政治文化，力图探究政治文化是如何改变了公共空间和人们的公共生活以及国家如何运作于各种组织之上并将政治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笔者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去研究中国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从1950年到1977年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时期，文化是如何被政治所塑造的。通过茶馆这个窗口去考察这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可以探究政治力量是如何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以及政治是如何渗入公共生活之中的。研究者还将看到革命和政治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政治与文化的最底层，观察在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之中二者的互动和联络。

四、地方、国家与社会

国家介入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努力，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在晚清，国家权力就试图延伸到社会底层，民国时期更有所强化。1949年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能力，表现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因此，在20世纪下半期，地方文化也被逐步纳入国家文化之中。

“地方文化”是一种区域性现象，与地方的地理环境、经济、语言等有关，这些因素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过去，地处长江上游的成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城市，与外界缺乏沟通，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国家文化”作出准确的定义很难，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发展以及强有力的大一统的现代国家政权，大幅度扩展了地区之间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地方文化的演变。“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且经常重叠。笔者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由国家权力所推动；二是主要服务于中央权力及其结构；三是存在一种全国性的模式。笔者关于茶馆文化的讨论，就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某些关系。

总之，1949年以后的国家文化是在同一性信念的指导下，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管理与推行的。从地方的角度看，这种由中央权力推动的全国文化，基本上达到了对文化的集中管理，对确立政治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统一是有帮助的，当然对地方文化也产生着较为复杂的多重影响。

为了理解地方文化的深层问题，我们把公共生活视为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公共生活总是在公众的眼皮底下进行，政府、精英、媒体和社区都参与了塑造城市面貌和城市文化的活动。在笔者关于麻将的研究中，就发现麻将可能会引发各种争论：它究竟是一种有益的娱乐还是一种有害的生活方式？它是一种高质量生活的表现还是反映了人们的无所事事？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关系模式若何？由此来看，关于麻将的争论，揭示了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剧变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复杂反应。人们如何在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现代道德准则中寻求平衡，如何评价大众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等诸种问题，均值得学界给予重视和进一步探讨。

大众媒体总是热衷于报道打麻将这样的大众娱乐所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媒体对大众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怀疑态度。媒体总是试图警告大众，要避免沉迷于这样的娱乐，防止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群体的喜好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民众玩麻将总是乐此不疲，而媒体对麻将的报道多是消极的信息。其实，麻将的流行与人们在新的市场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追求、在日常习俗中将麻将作为一种社交工具以及对赌博的某种心理迷恋等因素密切相关，绝非一种单一的生活惯习所能简单概括的。

国家和政府似乎主要关注官员、公务员在上班期间打麻将的问题，对普通人打麻将则基本不加干涉。政府更关注麻将是否会滋生腐败，是否造成变相行贿。与过去对麻将严厉管控的态度相比，尽管麻将经常与腐败、赌博等联系在一起，但是政府并没有推出任何反麻将的政策，只是对官员和公务员打麻将的时间、地点以及打麻将的参与者等进行了规定和限制。为什么政府采取这种宽松的

政策？其间原因值得深入分析。

五、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

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们作为社会与政治活动的舞台，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中心角色，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笔者主要关注的是公共空间如何演变为社会和政治空间以及如何在地地方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笔者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并不只是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它也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物质空间。当人们离开他们的私人领域（经常指他们的家），便进入公共领域之中。从物质的公共领域角度来看，茶馆与美国的酒吧、欧洲的咖啡馆等扮演着类似角色。在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是解决纠纷的场所，因此国家的司法权被社会基层所分解，这个所谓“最民主的法庭”（尽管这个词有些理想化甚至夸张化）发挥着稳定社会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运用“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来研究现当代中国，而是如何定义这个概念以适应独特的现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显而易见，探讨“公共领域”如何作用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的茶馆研究关注改革开放后商业乃至各种自发的社会组织的回归。随着经济的扩张、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政府控制的松弛以及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茶馆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的回归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自发的组织包括经济、行业、老年人、宗族和宗教协会等纷纷涌现，使得过去一切依靠国家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发现依靠社会关系纽带和群体组织，也能满足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某些需求。基于这些相关因素的生长，或许这就是“社会”缓慢回归的显著标志。

在这个时期，茶馆迅速恢复乃至蓬勃发展。民国时期，茶社公会控制着茶馆的数量。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可以自由开设茶馆，且随着竞争加剧，出现了各种类型的茶馆，每日顾客盈门。这表明公共生活的真正恢复，低档和高端的茶馆促进了公共领域的繁荣，企业经营者、顾客、中产阶级等皆因此受益，比如生意人要求一些经济自主，顾客追求轻松的表达空间，人们可以经常讨论各种社会话题乃至关于城市或者国内外的新闻热点。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1949年以来的公共生活，我们可以很好地揭示革命与其他政治运动是怎样影响普通人民、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茶馆的研究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这些研究描述了空前历史剧变时期的公共生活，可以覆盖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整个历史阶段。在这些历史阶段里，茶馆一直是街坊交流与社会互动的中心，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施加影响和竭力占领的公共空间。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确实为历史研究者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视角。

（本文作者 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 吴志军）